

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京·上海

1986.8

本卷主要编辑、出版人员

总 编 辑 姜椿芳

副 总 编 辑 石 磊

主 任 编 辑 刘加乾

责 任 编 辑 胡人瑞 赵雅琴

特 约 编 辑 (按姓氏笔画顺序)

毛昭晰 卢兆荫 朱龙华 任式楠

邵望平 杨 泓 莫润先 徐光冀

殷玮璋 郭振禄 黄慰文

编 辑 翟德芳

图 片 编 辑 罗锡鹏

地 图 编 辑 樊鸿林

资 料 核 对 金 英 刘小映 张素华 林 涛

索 引 编 辑 蒋仲英 马五一 鲁红莲

装帧版面设计 张慈中

责 任 校 对 姚秀丽 徐兆男

中国大百科全书

· 考 古 学 ·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总社:北京安定门外外馆东街甲1号 分社:上海古北路65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装 北京新华彩印厂彩图制版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54.75 插页 44 字数 2,020,000

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17197·85 精装(甲)国内定价: 29.55 元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胡乔木

副主任 (按姓氏笔画顺序)

于光远	贝时璋	卢嘉锡	<u>华罗庚</u>	刘瑞龙	严济慈
吴阶平	沈 鸿	宋时轮	张友渔	陈翰伯	陈翰笙
武 衡	茅以升	周 扬	周培源	姜椿芳	夏征农
钱学森	梅 益	裴丽生			

委 员 (按姓氏笔画顺序)

丁光训	于光远	马大猷	<u>王 力</u>	<u>王竹溪</u>	王绶琯
王朝闻	牙含章	贝时璋	艾中信	叶笃正	卢嘉锡
包尔汉	冯 至	司徒慧敏	吕 骥	吕叔湘	朱洪元
朱德熙	任新民	<u>华罗庚</u>	刘开渠	<u>刘思慕</u>	刘瑞龙
许振英	许涤新	孙俊人	<u>孙毓棠</u>	<u>杨石先</u>	杨宪益
苏步青	李 珩	李国豪	李春芬	严济慈	肖 克
吴于廑	吴中伦	吴文俊	吴阶平	吴作人	<u>吴学周</u>
吴晓邦	邹家骅	沈 元	沈 鸿	宋 健	宋时轮
张 庚	张 震	张友渔	张含英	<u>张钰哲</u>	陆 达
陈世骧	陈永龄	<u>陈维稷</u>	陈虞孙	陈翰伯	陈翰笙
武 衡	林 超	茅以升	罗竹风	季 龙	季羨林
周 扬	周有光	周培源	孟昭英	柳大纲	胡 绳
胡乔木	<u>胡愈之</u>	荣高棠	赵朴初	侯外庐	侯祥麟
段学复	俞大綏	宦 乡	姜椿芳	费孝通	贺绿汀
夏 衍	<u>夏 鼐</u>	夏征农	钱令希	钱伟长	钱学森
钱临照	<u>钱俊瑞</u>	倪海曙	殷宏章	<u>翁独健</u>	唐长孺
唐振绪	陶 钝	梅 益	黄秉维	曹 禺	董纯才
程裕淇	傅承义	曾世英	曾呈奎	谢希德	裴丽生
潘 菽	潘念之				

考古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夏 鼐

副主任 (按姓氏笔画顺序,下同)

王仲殊 安志敏 张政烺 贾兰坡 宿 白

委 员 王仲殊 王振铎 尹 达 安志敏 苏秉琦 张政烺

林志纯 胡厚宣 贾兰坡 夏 鼐 宿 白 裴文中

顾 问 于省吾 徐中舒 容 庚 商承祚

各分支学科编写组主编、副主编、成员

概 论 主 编 夏 鼐 副主编 王世民

旧石器时代考古 主 编 贾兰坡 副主编 吕遵谔

成 员 邵望平

新石器时代考古 主 编 安志敏 副主编 佟柱臣

成 员 任式楠

商 周 考 古 主 编 张政烺 副主编 张长寿

成 员 殷玮璋

秦 汉 考 古 主 编 王仲殊 副主编 卢兆荫 黄展岳

成 员 徐光冀

三国两晋南北朝
至 明 考 古 主 编 宿 白 副主编 徐苹芳

成 员 杨 泓

国 外 考 古 主 编 林志纯 副主编 石兴邦 朱龙华

成 员 张广达 莫润先

前 言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编辑类书的传统。两千年来曾经出版过四百多种大小类书。这些类书是我国文化遗产的宝库，它们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收集、整理和保存了我国历代科学文化典籍中的重要资料。较早的类书有些已经散佚，但流传或部分流传至今的也为数不少，这些书受到中国和世界学者的珍视。各种类书体制不一，多少接近百科全书类型，但不是现代意义的百科全书。

十八世纪中叶，正当中国编修庞大的《四库全书》的时候，西欧法、德、英、意等国先后编辑出版了现代型的百科全书。以后美、俄、日等国也相继出版了这种书。现代型的百科全书扼要地概述人类过去的知识和历史，并且着重地反映当代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二百多年来，各国编辑百科全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知识分类、编辑方式、图片配备、检索系统等方面日益完备和科学化。今天，百科全书已经在人类文化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各种类型的和专科的百科全书几乎象辞典那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一向有编辑类书传统的中国知识界，也早已把编辑现代型的百科全书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本世纪初叶就曾有人试出过几种小型的实用百科全书，包括近似百科型的辞书《辞海》。但是，这些书都没有达到现代百科全书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时的出版总署曾考虑出版中国百科全书，稍后拟定的科学文化发展十二年规划也曾把编辑出版百科全书列入规划，1958年又提出开展这项工作的计划，但都未能实现。

直到1978年，国务院才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并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此项工作。

因为这是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编辑工作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由于读书界的迫切要求，不能等待各门学科的资料搜集得比较齐全之后再行编辑出版；也不能等待各学科的全部条目编写完成之后，按照条目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混合编成全书，只能按门类分别邀请全国专家、学者分头编写，按学科分类分卷出版，即编成一个学科（一卷或数卷）就出版一个学科的分卷，使全书陆续问世。这不可避免地要带来许多缺点，但是在目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准备在出第二版时，再按现在各国编辑百科全书一般通行的做法，全书的条目不按学科分类，而

按字母顺序排列，使读者更加便于寻检查阅。《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按学科分类分卷，每一学科的条目还是按字母顺序排列，同时附加汉字笔画索引和其他几种索引，以便查阅。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内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各个学科和领域。初步拟定，全书总卷数为80卷，每卷约120~150万字(包括插图、索引)。计划用十年左右时间出齐。全书第一版的卷数和字数都将超过现在外国一般综合性百科全书，但与一些外国百科全书最初版本的篇幅不相上下。我们准备在第二版加以调整和压缩。

《中国大百科全书》按学科分卷出版，不列卷次，每卷只标出学科名称，如《哲学》、《法学》、《力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等。

全书各学科的内容按各该学科的体系、层次，以条目的形式编写，计划收条目10万个左右。各学科所收条目比较详尽地叙述和介绍各该学科的基本知识，适于高中以上、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使用。这种百科性的参考工具书，可供读者作为进入各学科并向其深度和广度前进的桥梁和阶梯。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除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之外，还准备编辑出版综合性的中、小型百科全书和百科辞典，与专业单位共同编辑出版各种专业性的百科全书，以适应不同读者的需要。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是在全国各学科、各领域、各部门的专家、学者、教授和研究人员的积极参加下进行的，并得到国家各有关部门、全国科学文化研究机关、学术团体、大专院校，以及出版单位的大力支持。这是全书编辑工作能够在困难条件下进行的有力保证。在此谨向大家表示诚挚的感谢，并衷心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使本书在出第二版的时候能有所改进。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

1980年9月6日

凡 例

一、编 排

1. 本书按学科分类分卷出版。一学科辑成一卷或数卷,有的两门或数门学科合为一卷。本学科《考古学》为一卷。

2. 本书条目按条目标题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第一字同音时,按四声的声调顺序排列;同音同调时,按笔画的多少和笔顺排列;如第一字相同,则按第二字,余类推。

3. 每一学科都列有本学科条目的分类目录,以便读者了解该学科的全貌。本卷所列分类目录,只为便于读者按类查索,并表明条目的层次关系,不完全反映考古学分支学科体系。

4. 各学科在分类目录之前,一般都有一篇介绍本学科内容的概观性文章。

5. 学科间相互交叉的条目,例如“郭沫若”在考古学及中国文学、“第四纪地质学”在考古学及地质学等卷中都分别设条,其释文内容分别按各学科的要求有所侧重。

二、条 目

6. 本书部分条目标题是一个词,如“金石学”、“瓦当”;部分是词组,如“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

7. 条目标题上方加注汉语拼音,部分属于考古学基本概念或国外考古的条目标题附有外文名,例如 qīngtóng shídài
青铜时代 (Bronze Age); 纯属中国内容的,如“殷墟”、“汉壁画墓”,一般不附外文。

三、释 文

8. 本书条目的释文力求使用规范化的现代汉语。释文开始一般不重复条目标题。

9. 较长条目的释文,设置层次标题。只有一层标题的,小题用楷体字;有二层标题的,分别使用黑体字和楷体字。

10. 一个条目的内容涉及其他条目时,采用“参见”方式。所参见的条目标题在本条释文中出现时,用楷体字排印,如“由后冈祭祀坑的发掘可知”;所参见的条目标题未在本条释文中出现时,另用括号加“见”字标出,如“明刀钱(见东周货币)”。

11. 条目释文中出现的外国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书刊名,一般不附原文。一些专有名词和学术名词,必要时附原文。

12. 本卷有关中国的资料,一般条目释文收集到1981年12月底,个别条目释文收集到1983年或1984年。

四、插 图

13. 本书部分条目配有黑白或彩色插图。黑白图排在条目释文之内;彩图汇编成插页,

在有关条目释文中注明“参见彩图插页第××页”。

五、参考书目

14. 在重要条目的释文后附有参考书目,供读者选读。

六、索引

15. 本书各学科均附有本学科全部条目的汉字笔画索引、内容索引和部分条目的外文索引。本卷并附有外国人名、地名译名对照表,以及中国旧石器时代动物化石的中文、拉丁文学名对照表。

七、其他

16. 本书所用科学技术名词以各学科有关部门审定的为准。未经审定和尚未统一的,从习惯。地名以中国地名委员会组织新华社、总参测绘局等单位审定的《世界地名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为准,少数常见的别译名同时列出。

17. 本书字体除部分先秦古文字及必须用的繁体字外,一律使用 1956 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

18. 本书所用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示的以外,一般用阿拉伯数字。

考古学

夏 鼎 王仲殊

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它们多埋藏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因此,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

考古学的产生有长远的渊源,但到近代才发展成为一门科学。近代考古学发祥于欧洲,以后普及到世界各国。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才在中国出现。作为一门近代的科学,考古学有一套完整、严密的方法论。它包含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和田野考古学等分支,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内的许多学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

考古学的定义和特点

“考古学”名称的由来 中国汉文中“考古学”这一名词,是从欧洲文字翻译过来的。欧洲文字中的“考古学”一词,如 Archaeology(英文)、Archéologie(法文)、Archaeologie(德文)、Археология(俄文)、Archeologia(意大利文)、Arqueologia(西班牙文)等,都是源于希腊文 Αρχαιολογία。希腊文的 Αρχαιολογία,由“ἀρχαῖος”和“λόγος”二字组成,前者意为古代或古代的事物,后者意为科学。所以在古代的希腊,Αρχαιολογία一词是泛指古代史的研究,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所使用的这个名词便属此种含义。17世纪这一名词被重新使用时,其含义稍有改变,是指对古物和古迹的研究。在17世纪和18世纪,一般是指对含有美术价值的古物和古迹的研究。到了19世纪,才泛指对一切古物和古迹的研究。

在中国,东汉(1~2世纪)时已有“古学”的名称。《后汉书》中说马融“传古学”,贾逵“为古学”,桓谭“好古学”,郑兴“长于古学”,这里所谓“古学”是专指研究古文经学,实际也包括古文字学。北宋中叶(11世纪),“金石学”诞生,其研究对象限于古代的“吉金”(青铜彝器)和石刻。到清代末叶(19世纪),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从铜器、石刻扩大到其他各种古物,所以有人主张将金石学改称为“古器物学”。由于清末至中华民国时期的“古器物学”已接近于近代考古学,所以也有人把欧洲文字中的“考古学”一词译为“古物学”(如1931年商务版《百科名汇》)。其实,中国的这种“古器物学”并不等于考古学,要经过系统化以后才可成为考古学的一部分。

考古学的定义 从现今通常使用的情形来看,考古学这一名词主要有3种涵义。第一种涵义是指考古研究所得的历史知识,有时还可引伸为记述这种知识的书籍;第二种涵义是指借以获得这种知识的考古方法和技术,包括搜集和保存资料、审定和考证资料、编排和整理资料的方法和技术;第三种涵义则是指理论性的研究和解释,用以阐明包含在各种考古资料中的因果关系,论证存在于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

现在,作为一门近代的科学,考古学已有它的充实的内容,周密的方法,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目标。虽然还没有一个被普遍确认的定义,但在全世界范围内,学术界对考古学一词的理解

是大致相同的。因此,可以从共同的理解出发,考虑到上述的3种涵义,给考古学下定义说: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对于这样的一个定义,需要作以下的解释和说明:

研究的年代范围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其研究的范围是古代,所以它与近代史、现代史是无关的。各国考古学都有它们的年代下限。例如,英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为诺曼人的入侵(1066),法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为加洛林王朝的覆灭(987),美洲各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为C.哥伦布(约1451~1506)发现新大陆(1492)。一般说来,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可以定在明朝的灭亡(1644)。

近一时期以来,英国有“中世纪考古学”,其年代下限延伸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1640);又有所谓“工业考古学”,其年代下限更延伸到18世纪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初期。在美洲,则有所谓“历史考古学”或“殖民地时代考古学”,它们的年代范围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直到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美洲各国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但是,英国的所谓“工业考古学”、美洲的所谓“历史考古学”或“殖民地时代考古学”,实际上是利用考古学的方法以研究近代史,所以不能算作真正的考古学。

相反,也有人把考古学的年代范围局限于史前时代,即没有文字记载的古代。这样,便把许多文明古国的历史时代也都排除在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之外,这也是不妥当的。考古学不研究近代和现代,而是研究古代,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考古学所研究的“古代”,除了史前时代以外,还应该包括原史时代和历史时代。就中国考古学而言,历史时代不仅指商代和周代,而且还包括秦汉及其以后各代;所谓“古不考‘三代’以下”是不对的。当然,历史越古老,文字记载越少,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也越显著。要究明人类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的社会历史,就必须在极大程度上依靠考古学,因而史前考古学与史前史就等同起来了。

作为实物资料的遗迹和遗物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实物资料。有些人望文生义,只看重一个“古”字,以为只要是考证古代的事物,不管是根据文献资料,还是根据实物资料,都可算是考古学。其实,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的遗存,即古代的遗迹和遗物。这就是它与依靠文献记载以研究人类历史的狭义历史学的最重要的不同点。考古学和历史学,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的两轮,不可偏废。但是,两者的关系虽很密切,却是各自独立的。它们都属“时间”的科学,都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为目标,但所用的资料大不相同,因而所用的方法也不相同。有人把依靠文献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的狭义历史学也称为考古学,这是不符合近代考古学的基本含义的。

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实物,应该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是经过人类有意识地加工的。如果是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则必须是与人类的活动有关,或是能够反映人类的活动的。这就说明,考古学是属于人文科学中的历史科学,而不属于自然科学,尽管在考古学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各种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方法。

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通常包括遗物和遗迹两大类。前者如工具、武器、日用器具和装饰品等器物,后者如宫殿、住宅、寺庙、作坊、矿井、都市、城堡、坟墓等建筑和设施。有的人片面地把“实物”理解为器物,只注重珍贵的古器物,而忽视许多重要的古代建筑、设施的遗迹,这是十分错误的。此外,农作物、家畜和渔猎、采集所得的动植物遗存,虽然多属自然物,但由于它们与人类的活动有关,有的更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所以也应属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虽然考古学的研究是以物质的遗存为依据,但作为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它的研究范围不限于物质文化,而是在于通过各种遗迹和遗物,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生产规模、技术水平等物质文化,也包括美术观念、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十月革命后,苏联曾把“考古学”改称为“物质文化史”。这虽然突出了考古学以实物资料为依据的特点,但实际上却局限了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因此,设在莫斯科的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虽然使用“物质文化史研究所”这一名称达30余年之久,但后来终于又重新改称为“考古学研究所”。

对人类古代社会的研究 人类的活动是具有社会性的。人类所制作的器物 and 所创造的文化,都是反映社会的共同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共同的文化传统。个人的创造发明,都是以他们所在社会中长期积累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文化传统为基础的。他们的创造发明,只有被他们所在社会中的其他成员接受、继承或传播,才能成为整个社会生产技术水平和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因此,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实物,应该是具有社会性的产物。无论是工具、武器、装饰品等器物,还是宫殿、住宅、城堡、坟墓等建筑、设施,实际上都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个人孤立的、偶然的作品。从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而言,必须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遗物和遗迹的整个系列和类型上,而不是研究孤立的、单独的一件器物。孤立的、单独的一件器物,只能算是古董,而不能成为考古学研究的科学资料。即使这件器物具有高度的美术价值,那也只能作为美术史研究的好标本,而不能当作考古学研究的好资料。考古学要究明的是整个社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文化传统,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天才的独创。在考古学研究中,一般不存在对个别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这不仅是由于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实物资料往往无法与某一历史人物相联系,更重要的还由于考古学研究的目标在于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而不在于某一个人的单独表现。

要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还必须在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扩大研究的范围。这就必须注意同一时期各地区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传播关系,也要注意人类社会文化在不同时期的继承、演变和发展的进程。这些横的联系和纵的进程,正反映在大量的遗迹群和遗物群之中,有待考古学家去分析和究明。

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 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考古学的研究不应限于对古代遗迹、遗物的描述和分类,也不应限于鉴定遗迹、遗物的年代和判明它们的用途与制造方法。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便是指导研究这种规律的理论基础。

有的历史学家,其中包括考古学家,不承认历史发展存在客观的规律。他们认为,除了论证历史事实之外,只有史料鉴定学和历史编纂学,而没有阐明历史发展规律的广义的史学。这当然是错误的。有的学者,例如60年代美国的“新考古学派”,虽然承认历史发展有客观的规律,但却把这种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混为一谈,这也是不对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现象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现象,是由于有“社会的人”这一因素的存在。恩格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起作用的是人,而人是赋有意识的,经过深思熟虑而行动,或受热情驱使而行动,并抱有预期的目的”。恩格斯又说:这“丝毫不能改变历史进程服从内在规律的这一事实”,但“对于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个别年代和个别事变的研究”,则是十分重要的。总之,我们一方面要重视社会发展的规律,一方面又不能把考古学写成简单的社会发展史。

考古学家要论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探求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点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以史前考古学为例,尽管考古学文化类型多种多样,但它们从发生、发展到最后的消失(即合并于另一文化类型或演变而成为另一文

化类型),总是具有共同的规律;由于自然条件、社会背景等的不同,各种文化类型也必然会有自身的特点和自己的具体演变过程。历史考古学也是这样,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许多国家的社会文化都有一定的共性,但也有它们各自的特点和个性。

考古学简史

近代考古学之具备上述定义中所含的性质,是有着相当长的一段发展过程的。从15世纪开始,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处于上升的阶段。他们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相应地发展了科学、技术和文化。这样,考古学也随着各门科学的产生而在欧洲出现。

考古学的出现,有它的历史背景。首先是欧洲的文艺复兴促进了人们对古典时代的语文和美术史的研究,从而开始对希腊罗马时代的雕刻和铭刻的搜集。不久又进而对基督教圣地巴勒斯坦地区的古迹和古物发生兴趣,后来这种兴趣还扩大到对近东地区的埃及、巴比伦等地的更为古老的古迹和古物的寻访和搜集。

当时,在西欧和北欧,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瑞典、丹麦等许多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相继成立。这些国家没有象希腊罗马那样古老的历史文献。它们企图凭借先民遗留下来的古迹和古物,宣扬古代历史,以增进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豪感。这也是近代考古学产生的原因之一。

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发展,推翻了《圣经》中关于上帝造人的神话。尤其是到了19世纪中叶,C. R. 达尔文(1809~1882)的《物种起源》、C. 莱尔(1797~1875)的《从地质证据来证明人类的古老》和T. H. 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出版使人们懂得人类的出现至少在数十万年之前,并认识到人类是从猿类演化而来的。于是,史前考古学产生了。它以进化论的理论为指导,按照近代自然科学的传统,以严格的科学方法从事研究,使作为科学的近代考古学从此得以成立。

纵观近代考古学的发生、发展的全部过程,可以按照阶段的不同,将它分为萌芽期、形成期、成熟期、发展期和继续发展期。

萌芽期 约从1760至1840年。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考古学的成长。当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有研究埃及的学者同行,在埃及寻访古迹和古物。作为战利品,拿破仑又从意大利、西班牙等地掠夺古物,在法国建立博物馆。他派亲族统治意大利,并大规模地发掘公元79年火山爆发时被埋没的庞培城址。特别是拿破仑的部下在埃及发现罗塞塔石碑,碑上的三体文字为学者们考释埃及象形文字提供了重要的钥匙;1822年法国学者J.-F. 商博良释出了这种象形文字,奠定了埃及学的基础。

另一方面,德国J. J. 温克尔曼(1717~1768)开始利用古代的遗物,而不是专靠古代的文獻,从事欧洲古代史的研究。他以保存在罗马等地的许多古代美术品为资料,写成他的名著《古代美术史》。有的学者称他为“考古学之父”,可见他对考古学影响之大,尽管古代美术史并不等于考古学。

形成期 从1840至1867年。

“三期论”的提出 19世纪中叶,考古学终于发展成为一门严谨的科学。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史前考古学。由于史前时代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对史前史的研究必须完全依靠考古学,而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又推动了整个考古学的发展。1819年,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C. J. 汤姆森从该馆所藏的史前古物着眼,提出了著名的“三期论”,认为史前时代的丹麦经历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时期。不久J. J. A. 沃尔索(1821~1885)又进而把“三期论”用于野

外古迹的分期,并以发掘工作中所见的地层关系作为证明。1843年,沃尔索发表了《丹麦原始时代古物》一书,使“三期论”从此成为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基础。

旧石器的发现和证实 上述丹麦的石器时代,只限于新石器时代(因冰川关系,丹麦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对旧石器文化的研究,是从英、法两国开始的,而法国J.布歇·德·彼尔特在索姆河畔首先发现旧石器,并认定是原始人类所用的工具。1859年英国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核查了布歇·德·彼尔特的发现,确认此地的旧石器是与已经绝灭的动物化石共存的,从而证实了他的学说。1865年英国的J.卢伯克(1834~1913)使用希腊语的词根,创造了“旧石器”(Palaeolithic)和“新石器”(Neolithic)两个名词,以表示两个石器时代的存在。当时,进化论已成为欧洲思想界的主流,它为史前考古学打开了前进的道路。1856年发现的尼安德特人的头骨化石,不久也被引用为进化论的物证,彻底否定了上帝于公元前4004年造人的神话。后来,E. A. I. H. 拉尔泰(1801~1871)又用古脊椎动物化石作标准,把旧石器时代分为3期;G. de 莫尔蒂耶则用第一次发现的地点作为各期的名称。这种分期法和定名法,至今仍为考古学界所通用。

新石器时代方面,1853~1854年在瑞士境内发现了“湖居”遗址,有着许多保存良好的遗迹和遗物。后来知道,湖居遗址中除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以外,还包含有铜器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存。1846~1864年在哈尔施塔特的发掘和1858~1860年在拉登的发掘,证实了欧洲的史前时代应包括早期铁器时代,这两处地名便被用作欧洲史前考古学中的两个分期的名称,后来又成为两个文化的名称。

埃及和西亚的考古工作 商博良释读古埃及象形文字以后,引起了欧洲人对埃及的古迹和古物发生更大的兴趣。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的考察队到埃及各地调查发掘。在这以前,意大利人G. B. 贝尔佐尼(1778~1823)在埃及滥掘古墓,掠取了大量珍贵的古物。到了1859年,法国A. 马里埃特担任埃及政府的古物局局长,才对这种盗掘加以控制。他任职30年,主持了30多处发掘,取得了丰富的收获。

19世纪初年,在波斯境内发现了刻有楔形文字的摩崖石刻。1835年英国人H. C. 罗林森(1810~1895)释读出贝希斯顿三体铭文中的一种楔形文字为古波斯文。后来,其他两种楔形文字也被考释出来,证明分别为古埃兰文和古巴比伦文。古文字学方面的这些研究成果,对西亚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有很大的帮助。1842年,法国人P.-É. 博塔开始发掘尼尼微城址。次年,他又在豪尔萨巴德发现了亚述王朝萨尔贡二世的宫殿址,获得了大批石刻浮雕和楔形文字的铭刻。1845~1851年英国人A. H. 莱亚德也在尼姆鲁德和尼尼微发掘出亚述时代的许多石刻浮雕、楔形文字的石刻和泥板。他出版了《尼尼微石刻图解》和《尼尼微发掘记》,影响很大。但当时的工作水平很低,主要是挖取珍宝,谈不上什么科学性。1850年,瓦尔卡古城址被发现,并进行发掘,虽然当时还不知道它是属于比巴比伦更早的苏美尔人的。

希腊罗马的古典考古学 从19世纪初期以降,英、法、德等国的古物爱好者相继到南欧游历、考察,往往将希腊罗马的石刻浮雕等精美文物运回本国出售,或赠送给博物馆。从雅典巴台农神庙拆下来的浮雕石刻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它是由埃尔金于1816年运到伦敦的,故被称为“埃尔金大理石刻”。有的人还发掘了希腊罗马的古城址和墓地,目的也在于攫取文物,不讲求工作的科学性。

从1863年起,意大利考古学家G. 菲奥雷利改进了对庞培古城遗址的发掘方法。他以恢复这一古城的原貌为目标,对遗址中的房屋遗存按单元进行全面的揭露,讲求层位关系,并将发

掘出来的遗迹保存在原地。在发掘中,贫民的居处和富人的邸宅同样受到重视;出土物不论精美与否,都被作为不容忽视的标本。他的这种审慎、周密的工作态度,为此后庞培城址的科学发掘打下了基础。

国际考古学会议的召开 作为近代考古学形成的重要标志,1866年在瑞士召开了第一次“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国际会议”。这使得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在国际学术界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到1912年为止,这个国际会议共开过14次。1932年改为“先史学和原史学国际会议”,在英国首次举行。它的第11次会议定于1986年在英国举行,届时还将加上“世界考古学会议”的副标题。1867年在巴黎举办的规模宏大的世界博览会,其中有一“劳动历史陈列馆”,以史前时代的劳动工具为主要陈列品。莫尔蒂耶负责欧洲各地标本的选定和陈列,马里埃特则负责埃及考古学标本的选定。这样,考古学在广大群众中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成熟期 约从1867至1918年。这时期考古学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兴盛局面。这主要表现在类型学的发展和史前考古学的系统化,自然科学的方法被应用,田野调查发掘工作开始科学化,近代考古学从欧洲、北非、西亚普及到东亚和美洲。

类型学的发展和史前考古学的系统化 前一时期开创的类型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主要是划分器物类型的工作更为细密、准确了。除了按照形态的变化把器物排比成“系列”以外,还根据出土的地层关系来确定系列中各器物类型的年代先后;排比不限于某一种器物,而是将许多不同种类的器物分别排比成系列而互相参照。经过排比之后,各种不同类型的器物组合往往可以代表某一考古学文化。在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1912年步日耶把上旧石器时代调整为3期,连同下旧石器时代的3期,将旧石器时代一共分为6期。他的“六期说”体系被考古学界长期沿用,但后来被证明这只适用于欧洲。1892年,A.布朗提出在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应有一个过渡期,称为“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但这一术语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逐渐采用。

瑞典的O.蒙特柳斯继沃尔索之后,大量使用比较考古学和类型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并将类型学的理论加以系统化。从1885到1895年,他把北欧的新石器时代分为4期,青铜时代分为5期。这时,早期铁器时代的哈尔施塔特期和拉登期2期被进一步确定下来。这样,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欧洲史前考古学的整个体系得到了确立。法国学者J.德谢莱特(1862~1914)于1908至1914年出版的四卷本《史前考古学手册》,总结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叶的史前考古学成果。

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和史前考古学的绝对年代 在史前年代学方面,这一时期已开始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例如,20世纪初,地质学家把欧洲的地质年代确定为4个冰期和3个间冰期(见第四纪考古学)。于是,考古学家把旧石器时代文化与冰期、间冰期的划分联系起来,进行分期。各冰期的绝对年代最初是根据地层的厚度来推测的,极不可靠。1910年瑞典德耶尔(1859~1943)提出了季候泥层分析法,判定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泥层的绝对年代可以上推到1万年左右。不过这一分析法的应用只限于一定的地区,而且必须将考古资料与地质年代学的泥层联系起来,才能判定。此外,蒙特柳斯除了就欧洲青铜时代的相对年代进行分期以外,1904年还对各期的绝对年代作过推测。

考古发掘工作的科学化 在这一时期中,考古学最重要的发展是发掘方法的改进。可以说,真正的、科学的考古发掘,是从这时期开始的。首先是明确了发掘的目的不是为了挖宝,而是要把地下的古迹和古物揭露出来,了解它们原来的位置、布局和后来的变化,这样就可以使

由于时间的推移而被灰烬和泥土掩埋起来的人类历史得到重现。

19 世纪后期,德国和奥地利的考古学家在希腊和意大利发展了考古发掘的技术。在庞培古城遗址,意大利的考古学家进一步发展菲奥雷利的发掘方法。在近东,1870 年以发现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古城而著名于世的 H. 谢里曼,除了在发掘中采集全部遗物并注意地层关系以外,他还要求充分做好包括绘图、照像在内的各种记录,迅速整理资料,及时发表报告。英国的 F. 皮特里在埃及的发掘工作中,更讲求发掘方法的科学化,他于 1904 年写出《考古学的目的和方法》一书,总结了自己的工作经验。在英国,皮特里的前辈 A. H. L. -F. 皮特-里弗斯则被视为科学考古发掘的创始者,早在 1880 至 1900 年,他便已用上述的科学方法在英国克兰伯恩蔡斯地区发掘居住址和古墓。这样,考古学也就被承认是利用实物的证据以探索古代人类历史的一门科学了。

欧洲、北非、希腊和近东地区的重要新发现 这一时期的考古新发现,解决了许多重要的问题。首先是从 1875 年起,在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陆续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它们与洞穴中的象牙或兽骨的雕刻品一起被称为“洞穴艺术”或“旧石器艺术”。1894~1895 年皮特里在埃及涅伽达发现王朝时代以前的墓地,后来经过他的分期排比,列为第三十期到八十期,其中第七十六期和七十七期相当于历史时代的第一朝,从而使得史前文化和历史时代的文化衔接起来。在希腊和小亚细亚方面,由于谢里曼在特洛伊城址、A. 伊文思在克诺索斯城的发掘,把希腊的历史从古典时代上推到传说中的“荷马时代”,又进而追溯到史前时代。关于小亚细亚东部和叙利亚北部的赫梯帝国,过去虽曾发现过石刻浮雕和铭文,但到 1888 年才由 A. H. 塞斯(1845~1933)证明它们是属于赫梯人的,并初步考释出赫梯的文字;德国人发掘赫梯国的首都哈吐沙,发现了数千片前 14 世纪的泥板文书,捷克斯洛伐克的 B. F. 赫罗兹尼考释出赫梯语的楔形文字,并将泥板文书翻译出来。在两河流域,1874 年泰洛赫遗址的发现,证实了这里的遗存属于苏美尔人的文化。此外,德国人 1899~1914 年在巴比伦古城和 1903~1904 年在亚述故都阿苏尔城址的发掘,由于成功地清理出用土坯砌成的墙壁,还利用探井法搞清地层,使这两座都城的部分面貌被清楚地揭示出来。

考古发掘工作扩展到新地区——美洲和东亚 在这一时期,欧美的考古学者还到中美和南美各地进行调查发掘。第一次大规模的发掘,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在洪都拉斯的科潘地方的马雅文明遗址进行的,1896 年发表了正式的发掘报告。德国的 M. 乌勒,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一直在秘鲁的帕查卡马克进行发掘,他的发掘报告于 1903 年出版。

在中国,帝国主义者为了觊觎中国的领土,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纷纷派遣探险队到新疆,搞考古调查、发掘,以掠取古物。东亚的日本,以 1868 年的明治维新为开端,逐渐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受欧美考古学的影响,也开始在国内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日本和俄国还派人在中国的东北地区进行掠夺性的考古发掘。当时中国的考古学界,还停留在金石学的阶段,没有人到野外去做考古发掘工作。

发展期 从 1918 至 1950 年。1914 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的考古研究工作很快就恢复开展起来,使考古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有更多的考古新发现,更重要的是在理论方面的发展和提高,调查发掘工作更加科学化,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法广泛应用,考古工作在地域上进一步扩大,成为世界范围的考古学。

理论方面的发展和提高 1917 年十月革命以后,苏联考古学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从事研究,使苏联考古学的面貌为之一新。西欧的学者也相

当重视理论。尤其是英国的 V. G. 柴尔德,在一定程度上也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前一时期在考古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汤姆森的“三期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这时遇到了 L. H. 摩根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另一种“三期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的挑战。后者是按照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阶段划分的,被苏联考古学界以及柴尔德等西欧的考古学家所采用。但汤姆森的“三期论”仍然有它一定的作用,所以并没有被国际学术界所抛弃。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考古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文化”代替了“时期”;从前的所谓“阿舍利时期”、“莫斯特时期”之类,这时都改称“阿舍利文化”和“莫斯特文化”等。这主要是因为考古学的“文化”有地域上的局限性,一种“文化”不能代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时期,各种不同的“文化”往往在同一个时期中并存,实际是各自代表具有同样文化传统的共同体。明确了考古学“文化”这一基本概念之后,考古学研究就必须有更多的资料和对资料更为精细的分析,而研究的结果就能更符合于客观的实际。柴尔德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发表的《欧洲文明的黎明》、《史前时代的多瑙河流域》和《远古时代的东方》等著作,便是运用考古学“文化”这一正确的概念进行广泛、深入研究的杰出代表。

调查发掘工作的更加科学化 在田野考古学方面,调查发掘工作的科学性又有了显著的提高。最能代表这一时期田野考古学的水平的,是英国的考古学家 M. 惠勒。他总结前代田野考古学家们的经验并加以发展,除了提高发掘的技术以外,还强调要提高发掘的目标。他主张考古学家要掘出古代的“人民”,而不仅仅是掘出古代的文物。后来,他把他的观点和方法写成一本题为《从土中发掘出来的考古学》的书,是现代田野考古学的杰作。另一位田野考古学家,英国的 O. G. S. 克劳福德(1886~1957),在调查工作方面作出了新贡献。他本是地理学家,所以充分注意地理环境对古代人类社会的影响。他的著作《田野考古学》,主要是总结了他在广大的田野上进行考古调查的经验。他还发展了航空考古学,使空中摄影成为调查地面上的古代遗迹的得力工具。

由于田野考古工作水平有了新的提高,世界各地的许多重要的遗迹才能运用新的技术和方法进行发掘,而发掘出来的遗物也能得到妥善的处理。1923 年英国 H. 卡特在埃及发掘图坦哈蒙墓,1926 年英国 L. 吴雷在伊拉克境内的乌尔发掘苏美尔王陵,都获得了成功。这与 19 世纪中期在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发掘相比,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广泛应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都有快速的发展,它们在考古学上的应用比前一时期更为广泛和普遍。例如,在勘察方面,除利用空中摄影技术探索地面上的遗迹以外,还利用“地抗力”的测定法以探测埋藏于地下的遗迹。在分析、鉴定方面,则应用地质学、物理学和化学的方法判别岩石、矿物和金属制品的质地和成份,应用体质人类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的方法以鉴别人骨的性质、兽骨的种类和农作物的品种等。结合考古发掘,进行古代土壤和其中所含孢子花粉的分析以了解古代的植被面貌(见考古植物学),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在这个时期,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也被考古学家们所广泛应用。除了利用地图的测绘以显示遗迹和遗物的分布外,还可以把遗迹、遗物的分布图与带有古代植被的地形图结合起来,以考察古代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英国考古学家 C. 福克斯在 20~30 年代所著的《剑桥地区的考古学》和《不列颠的个性》两书,是有关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著作。

考古学研究的世界化 这一时期的特点,还表现在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学术知识的传播,考古工作进一步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促进了考古学研究的世界化。

首先是苏联的考古工作在其辽阔的国境内广泛开展,从东欧、中亚到西伯利亚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存。特里波利耶文化遗址的发掘,究明了乌克兰新石器时代至铜石并用时代农业部落的社会结构。黑海沿岸古希腊城邦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当地奴隶制社会的经济、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С. П. 托尔斯托夫在中亚阿姆河流域的调查发掘,把花拉子模的历史从中世纪上推到新石器时代。С. В. 吉谢列夫在南西伯利亚的发掘,使这一地区长达 4 000 年的古代史得到恢复。在苏联的东欧地区,斯拉夫民族的起源和中世纪俄罗斯城市的发展是两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经过考古学家的努力,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南亚次大陆此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考古局局长由英国人担任。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考古工作是英国 J.H. 马歇尔在哈拉帕城址和摩亨佐达罗城址的发掘。发掘证明,这两处古城是“印度河文明”的两个中心,其年代可以上溯到前第 2 千年的前半期,这里不仅已有冶铸青铜的技术,而且还出现了文字,从而纠正了吠陀时代以前的印度完全处在史前时代的错误结论。马歇尔还发掘了历史时代呾叉始罗等处的佛教遗迹,但发掘工作的水平不高。到 1943 年惠勒任印度考古局局长以后,印度考古学的面貌才有新的变化。

中国的考古发掘工作是在这个时期正式开始的,而且很快就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首先是 1927 年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共同发掘北京周口店的旧石器时代遗址。1929 年裴文中在该遗址发现了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其次是从 1928 年开始,中国学者李济、梁思永等在河南省安阳发掘殷墟,证明这里是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宫殿址和王陵出土的大量文物说明,前第 2 千年后期的商殷文化已达到了高度的水平。在这以前,瑞典人安特生于 1921 年在河南省渑池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接着又在甘肃和青海发掘了许多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址,他所推定的年代序列,在 40 年代为中国学者所纠正。1928 年,中国学者吴金鼎在山东省章丘县的城子崖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1931 年梁思永发掘安阳后冈遗址,从地层关系判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殷文化的年代先后序列。于是,黄河流域史前时代文化和历史时代早期文化的基本轮廓得到了初步的究明,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开创了良好的端绪。

日本考古学发端于 1877 年,美国人 E. S. 莫尔斯(1838~1925)在东京郊区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绳纹文化的遗址大森贝冢。1884 年日本学者在东京弥生町发现弥生文化的陶器,此后的发掘证明弥生文化已有铜器和铁器。在年代序列上,继弥生文化之后的是古坟文化,它属于日本的原史时代。1918 年鸟居龙藏发表题为《有史以前的日本》的著作,对前一时期的考古工作进行了总结。1934 年在奈良县开始对藤原宫遗址进行调查发掘,把田野考古工作的范围扩展到历史时代;1949 年在群馬县岩宿发现“无土器时代文化”,又将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推进到旧石器时代。为了引进西欧近代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滨田耕作曾到伦敦大学向皮特里学习,归国后在京都大学举办考古学讲座,培养了许多新的考古学家。

埃及以外的非洲地区曾被看作“黑暗大陆”,没有什么古代文化可言。但在这一时期,不仅法国人在地中海沿岸的突尼斯等地发现了迦太基和罗马时代的遗迹和遗物,而且在非洲各地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步日耶曾在 40 年代对出土的旧石器作过研究,还临摹了南非的岩画。30 年代以来,R. 布鲁姆在南非,L. S. B. 利基在东非发现了南方古猿的化石,它们可能是直立人的直系祖先,与之共存的据说有打制的砾石工具,以后称为奥杜韦文化。因此,有人认为东非也许是人类最初的摇篮。

美洲的考古工作也获进一步开展。墨西哥和秘鲁是美洲古代文明的两个中心,最受重视。